

【编者按】

今年是“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红山文化积石家最新考古成果也于近日首次向社会公布。

红山文化反映的一体多面、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奠定的龙图腾、玉为尊的文化传统，形成的天人合一、尊祖崇宇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已经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有机质。红山文化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后续影响，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红山文化C形龙。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鸟居龙藏”之地

最早发现红山文化的是一个叫鸟居龙藏的日本人。1906年，喀喇沁旗王府邀请了一名日本人担任崇正学堂的教习，此人便是鸟居龙藏。相比于教书，鸟居龙藏更热衷于做考古调查。

最初，老百姓在红山附近发现了一些古代遗迹和遗物，鸟居龙藏得到消息后，循着线索来到红山，调查了附近的文化遗址，好在他主要是采集标本，并未进行挖掘。后来，鸟居龙藏将其当年的调查资料整理成书，写成《蒙古旅行》一书出版，书中第一次介绍到了红山文化的遗迹。

有意思的是，红山文化中，玉猪龙、C形龙和玉鸟等都是比较知名的玉器，可以说红山文化遗址确实是“鸟居龙藏”的地方，巧合的是，它又被一个叫鸟居龙藏的人发现，可谓在发现之初就带有一丝神秘色彩。

后来的法国人桑志华、瑞典人安特生、日本人滨田耕作等都曾探访过红山文化的遗址，其中桑志华采集的许多红山遗物，曾收藏于他创办的北疆博物院，也就是如今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这些调查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考古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北方古人类文明的错误认知。

第一位关注红山文化的中国学者是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他是近代名人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在美国读书时就看到西方学者发表的红山文化的考古资料，回国后不久，就进入赤峰进行考古调查，并发表了相关的调查报告。

1955年考古学家尹达出版了《新石器时代》一书，书中的文章《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这是继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后，我国再次命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掀开了红山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自红山文化的命名至今，伴随着牛河梁、兴隆沟、魏家窝铺和近年来刚发掘的敖汉旗元宝山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和调查，红山文化的考古学面貌日渐清晰：它距今6500年至5000年，主要分布在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是以玉器为主要文化符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

龙图腾 玉为尊

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孙金松院长介绍：“（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家）M15出土的玉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土中体量最大的一件。”“M”在考古学中是墓葬的简称，M15出土的玉龙造型是红山文化玉器最有代表性的器形——玉猪龙，这类玉器一般整体呈一卷曲的动物形象，首尾相接处有一缺口。古代有“满者为环，缺者缺”的说法，玉猪龙因呈C形，有缺，故又名玉兽玦。

玉猪龙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龙图腾的雏形，它口吻较长，肥首大耳，双眼睛，鼻端前突，与猪的形象极为相像。汉字“豕”的下面是“豕”，即猪的意思，猪是先民最先驯化的六畜之一，也是家庭财富的重要象征。“豕”为墓葬的意思，是人们死后的居所，其下面的“豕”也与猪相关，意为猪脚难行的样子。红山先民在墓中放置玉猪龙等随葬品，可能希冀死后仍能享受生前富足的生活。也有人认为玉猪龙像是一个“胚胎”，代表着生命的起点，红山文化的先民将其放在墓葬中，靠近逝去的躯体，表现的是生命轮回，逝者希冀回到生命的起点得以重生。

另外，玉猪龙又有“玉熊龙”的称呼，玉猪龙的圆耳大眼确实也与熊的有些相像。从红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辽西、内蒙古东部等地来看，这里是黑熊、棕熊等熊类动物的活动区。因着万物有灵的观念，先民们对熊的崇拜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像“三皇五帝”中黄帝的部落就有熊氏，《淮南子》中记有大禹治水时，曾化身熊开凿大山，其妻子涂山氏看到后变为石头。这些记载中虽包含有传说的成分，但早期先民崇拜体格健壮、勇猛有力的熊并将其作为图腾却是可信的，所以玉猪龙也有可能描绘的是熊的形象。

1971年春，赤峰市翁牛特旗的农民张凤祥在整理土地时，意外发现了一个粘着土的“勾子”，这件勾子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红山文化C形龙，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被誉为“中华第一龙”。C形龙外形与玉猪龙有着诸多相似，都为C形，且都有用于悬挂的穿孔，只是相比于玉猪龙，体型更为修长。根据器物的演变规律来推测，C形龙可能是在“玉猪龙”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演化而来。

C形龙躯体似蛇，梭形的长眼凸出，吻部长而前凸，已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元素，尤其是脊背还附有飘逸的长鬃。C形龙代表了红山文化先民高超的制玉技能，作为国宝级文物已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华夏银行标识中的龙形便源于此。

红山文化玉猪龙。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红山文化玉鸟。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神秘『红山文化』情趣盎然 玉意无穷

■ 刘享享

近日，“中华文明的璀璨星辰‘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召开。研讨会上，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家的最新考古成果首次向社会公布。

在满天星斗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红山文化作为其中璀璨的一颗，再次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



红山文化勾云形器。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人物春秋

残碑背后的贤德父子

■ 张雨

海口秀英学校建在明代乐古书院、怀沙亭旧址之上，现遗存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年）《重修怀沙亭碑记》及残碑一方，碑上镌刻“滨涯张乡贤，讳善教，合邑仰慕，公举人亭配享……”能得到全县仰慕，与“岭南一人”、明代心学奠基人陈白沙一起得到纪念，张善教是何许人？

据乾隆《琼州府志》，“张善教，琼山五原人，万户贤之子。领洪武丙子应天乡荐，授岑溪谿。丁内艰。永乐间，改沙县谿。学行粹洁。未逾年，士皆从化。倡诸生以新文庙，县父老闻之，欣然来助。后致仕，建滨涯亭，与赵谦、王惠、杨升咏赏，为一时重”。

万户在元末明初属军政合一的高级官员，正三品。《广东通志》记载，“张贤，琼山人。元至正中，陈子翔，陷郡城。子翔死，其弟有庆继之，民被荼毒。贤倡义兵，斩击伪万户袁元贵及其党千余人，遂复郡城。事闻，劳以金币，授安抚金事。为时名将。洪武元年，归附。二年，以贤良（明代荐举名目之一）例起之，行至广州，告老归田。祀乡贤”。

滨涯张氏自始祖张耀，宋末元初随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征战戍守海南后，经三代人，由进义郎、万户府知事、吉阳军吏目，世代为军所积累的资历，于郡城倾覆之际匡扶正义能捍大患。张贤生前由乾宁安抚司金事升任黎兵屯田万户府万户，极尽尊贵。

元明鼎革之际，张贤长子张善教由武纬而文经，洪武年间从教考古先生赵谦，洪武丙子（1396年）参加应天乡试中举，先后任广西岑溪和福建沙县教谕，宦迹斐然。

据康熙《沙县志》记载：“张善教，巍然以师道自立，所游止之地，人以琼台琼谷目之。”“琼台琼谷”，代指人间胜景。“师道自立”出自理学大师周敦颐的《通书·师弟》，意指张善教在本职工作中的师道尊严和工作之外的言行举止，已成为当地尊崇的人文标杆。

又据《八闽通志》所记：“沙县亭，永乐十二年儒学教谕张善教建。”这是沙县教谕张善教在倡新文庙、士皆从化后留给沙县的一道人文景观，亭子的名字便是其家乡琼山的名称。

致仕回乡后的张善教，修建了“乡人称便”的蒲茂桥和文人雅聚的滨涯亭。“滨涯亭，前池中有石墩，植芙蓉以为游息之所，时与赵谦、王惠、杨升诸贤赏咏。”唐胄在纂修正德《琼台志》时，感叹明代琼州文化之盛，“国朝洪武、永乐间，吾郡耆德聚盛，学校则有唐公洪、赵公谦，及余榕庵曾祖诸人；乡落则吴公伯雄、文祥、王公益、徐公益、杨公升、朱公继、郑公观、吴公均、张公善教”。唐胄所列举的诸位耆德，日后几乎都成为万历《琼州府志》中记载的乡士贤人。

海口市丘海大道东侧有座“张氏宗祠”，四合院式建筑，周边原为滨涯张氏聚落。据宗祠内《绍造祠碑》上“自四代祖金事公（张贤）致仕，世居郡西之滨涯，每以祖宗世系随附，五代祖教谕公（张善教）铭刻在念廿余载，乃造谱而创祠焉，置祭田，行祀礼，以春为期，相传后代，固金事公之志，是教谕公之善继也”等记述来看，张氏宗祠原为家祠，创建于永乐初年，此后几经修葺。因万历年间赐葬海瑞卜地于此，部分张氏族人迁居富教、博养等村。2023年修缮一新后，张氏宗祠与海瑞文化公园连成一片，成为了解琼州名宦与本土贤达人士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范本。

张氏宗祠正寝内有四根石柱，分侧两副楹联。其一为清代乾隆年间琼州知府萧应楹的题联：“望乡贤贤哉是父是子，助恢奇甸允矣难弟难兄。”上联说的是张贤、张善教父子成就了滨涯张氏的名望，而下联则带出滨涯张氏在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带兵平乱的又一人物张德。《琼台志》记载：“岁丙午三月，五原郡人张贤与弟德等倡举义兵，斩袁元贵等，恢复郡城。平乱后张德以捍陈子翔寇有功授澄迈知县。”



海口市秀英区滨涯村“张氏宗祠”内的一副楹联，记述了张贤张德兄弟、张善教父子造福桑梓的功德。张雨摄

学林一叶

性情傅雷

■ 孙东岳

傅雷（1908年—1966年）是我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上海南汇人。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怒安”，是他早故的父亲给他起的，用意是“圣人一怒而安天下”，与雷字配合起来，就使人联想到“怒发雷霆”的意蕴。

熟悉他的朋友都有那么一个印象，这个人动不动要发怒的。他对什么事都不肯苟且，对什么人也不去敷衍，对于他所厌恶的东西，是一点也不肯妥协的，经常是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昆明一家艺术学校聘请他去当教授，他从上海出发，带着行李物品，跋涉海陆长途。

可是到了之后，在讨论教学计划时意见不同，他马上扛起还没打开的行李，又回到了上海。

傅雷从事翻译工作30余年，翻译了32部外国文学名著，约500万字，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对自己翻译工作要求极高，每翻译一部书，首先是对原书反复阅读，吃透原著精神和全部细节，不理解的地方一一列出，然后查考资料，或请教他人。请教的人包括专家、律师、医师、建筑工程师、工厂老板、银行家、留法同学等。有些问题不能在国解决，他就写信到国外请教。直到他把所有疑难问题都解决了，才开始翻译。

他还将书中一些细节，当作一座

屋院的结构和室内家具的布置，按原著画出一张平面图来，然后才落笔翻译出来。

傅雷知道自己普通话说得不好，会影响他译文的表述。他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当作学普通语的课本，经常反复诵读，像《月牙儿》《柳家大院》这些作品，他简直读得会背。傅雷还请演话剧的朋友到家里来朗诵剧本，学习对话中高低抑扬的节奏。有时他译好一段写景或对话，便把家人和帮助做家务的女工请到书房，自己高声朗诵，征求大家的意见，直到把译文改到自己认为天衣无缝，才算定下来。

他最初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受到普遍好评与重视，但他自己却极为不满

意，后来又把这部一百几十万字的长篇，完全丢开原译，进行了一次新译。

出版社出版他的译著，做具体编辑、出版、印制工作的同志，说起傅雷都感到头疼，因为他的译文不好动，一动他就会跟人家大吵大闹。出版环节，他还要干预，出版式样、装帧设计、印刷字体、纸张用料他都要过问到底，一丝也不肯放松。

傅雷虽然性格耿直、倔强，但骨子里是通情达理、光明磊落的，因此，他并不孤独，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朋友，许多还是莫逆之交。他与朋友直来直去的争论，都是从善意出发，不带有任何思想渣滓，所以，他们的关系不但没有产生隔阂，反而促进了彼此间的了解。

文建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